

## 書 評

羅 樂 然\*

Mitje Saje, ed.

**A. Hallerstein - Liu Songling - 劉松齡 : *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***

Maribor: Associ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, 2009, 381 pages. ISBN 978-961-6304-26-9

學界對在華傳教士的研究視野，一直集中於明末清初時期的傳教士、<sup>1</sup>禮儀之爭的研究以及地區公開或秘密傳教的情況。<sup>2</sup>不過，較少人關注在禁教期間，於朝廷效力的傳教士如何在朝廷禁教、又重用西洋傳教士的矛盾安排下，繼續服務朝廷及進行傳教活動。<sup>3</sup>本書評所要討論的論文集，係以禁

---

2012 年 11 月 2 日收稿，2013 年 1 月 6 日修訂完成，2013 年 1 月 31 日通過刊登。

\* 作者係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研究助理。

Login Lok-yin Law is a research assistant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.

- 1 明末清初傳教士研究，學界有豐富的成果，了解其研究成果，可參黃一農，〈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〉，《新史學》7.1(1996.3): 137-169。
- 2 關於禮儀之爭，可參孫尚揚、鐘鳴旦，《一八四零年前的中國基督教》(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4)，頁 343-390；秘密傳教的研究，可參張先清，《官府、宗教與天主教：17-19 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)。
- 3 這方面的研究，可參考劉芳，「乾隆禁教時期的天主教活動」(廣州：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，2006)；及張澤，《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》(臺北：光啓出版社，1992)。劉芳較集中在地區上的秘密傳教情況，而張澤則關心朝廷中的傳教士。但這些研究不足以全面

教期間活動的傳教士劉松齡 (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, 1703-1774) 爲主角，就他對各方面的影響作論述。<sup>4</sup>

米加 (Mitje Saje) 教授在 2009 年所編的 *A. Hallerstein - Liu Songling - 劉松齡: 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*，是一本結集斯洛維尼亞 (Slovenia) 及中國兩地學者努力而成的論文集。(頁 9) 不過，由於漢學界對劉松齡研究認識較少，故即使在 2009 年出版後，亦只有少數學者有留意過此書。<sup>5</sup> 然而，劉松齡作爲一位西洋傳教士，在中國生活超過四十年，其對中國以及東亞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影響力，同時，亦是讓歐洲人了解十八世紀中國具體情況很重要的渠道。於是，來自不同的歐洲學術組織，先後發現劉松齡作爲東亞文化交流橋樑的重要性 (頁 9-12)，各種研究項目及文藝活動均紛紛展開。<sup>6</sup> 最終在 2009 年，在米加的安排下，得到了歐盟、中國不同機構及斯洛維尼亞國內各機構的支持，完成了這本論文集。<sup>7</sup>

全書分爲九篇文章，頭三篇是由三位來自斯洛維尼亞的政府官員及檔案館成員，介紹論文集出現的因由，及整個研究計畫帶出的藝術、文化及學術等方面的成就。後五篇文章則是討論劉松齡在中國期間的各種科學及文化成

---

地論述及認識禁教期間的傳教士生活。

- 4 劉松齡，字喬年，是來自奧地利管治的斯洛維尼亞地區耶穌會傳教士。在乾隆年間，先經過澳門，並在當地學習中文。最後在 1739 年，被朝廷邀請，到北京任職欽天監副監，及後在乾隆十一年 (1746)，取代當時剛去世的戴進賢 (Ignatius Kögler, 1680-1746) 成爲欽天監正監，直至 1774 年離世爲止。期間，劉松齡協助清廷完成天文技術研究、地圖測繪、曆法計算及外交接待等工作，可說得上是一位多元化的傳教士。關於他的生平，除了本書，亦可參考高王凌，〈劉松齡：最後的耶穌會士〉，《中國文化研究》2006.4(2006.11): 166-173；高王凌，〈劉松齡筆下的乾隆十三年——劉松齡研究之二〉，《清史研究》3(2008.8): 93-100；及高王凌、熊月釗，〈宗教與科學的雙重失敗〉，《中州學刊》187(2012.1): 135-140。
- 5 雷敦蘇 (Edmund Ryden) 教授曾在《神州交流》中，就該論文集的格式、語文運用及編排上作出了不少批評，該書評見《神州交流》9.3(2012.7): 141-144。
- 6 斯洛維尼亞籍華裔藝術家王惠琴，在 2007 年時，創作了一套介紹劉松齡一生的舞臺劇，後亦曾在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展示，可見斯洛維尼亞高度重視劉松齡。關於此，詳參薩里瓦·索思奇 (Sanval Sosic)，〈超越時空〉，《畫刊》2011.1(2011.1): 74-77。
- 7 除了斯洛維尼亞檔案館外，還有中國國家檔案館、上海市檔案館等等，有多個機構互相合作有關研究項目。

就。

首先，米加作為論文集研究的主要推動者，他以其個人的研究心得為切入點，探討劉松齡在華生活的研究如何被再發現成為學術議題。<sup>8</sup>他的文章提及了劉松齡在文化上及科技上的貢獻。例如，劉氏 1760-1761 年協助計算全中國的人口，（頁 35）同時在測繪地圖及各種天文發現上亦皆有所貢獻。（頁 36）此外，他還說明劉松齡協助清廷處理葡使來華的經過。（頁 40-44）作為斯國的劉松齡研究者，米加也整理了從閻宗臨（1904-1978）、<sup>9</sup>鞠德源等中國學者到斯洛維尼亞 Stanislav Južnič 等學者關於劉松齡的研究概況。米加的論文對於毫不認識劉松齡的讀者，有提綱挈領之用。

接著是 Zmago Šmitek 的論文。他以傳教士往來的信件為主要研究內容，介紹並說明劉松齡作為一個來自歐洲的傳教士，在清代乾隆年間欽天監生活及各種活動的具體情況。由於劉松齡與其他傳教士及友人的書信，大多提及他在測繪地圖、任職欽天監時的生活，故此，這些信件呈現了劉氏在天文、地圖及科技上的成就。<sup>10</sup>特別是地圖方面，Šmitek 收錄了劉松齡曾參與的地圖，包括澳門、印度果阿及中國全圖等，這些都收藏於歐洲的檔案館中，此次出版，讓讀者有窺探的機會，是此論文集其中一個重要的貢獻。

Stanislav Južnič 是第三篇論文的作者，早在 2003 年，他曾出版專書探討劉松齡的科技成就，而他在本書中，則集中討論劉松齡在電學的成就。<sup>11</sup>作者指出劉松齡利用在歐洲所學關於電學的理論及知識，讓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，1735-1796 在位）和少數中國人認識當時西方的相關科學技術。

---

8 Mitja Sage, "Rediscovering Augustin Hallerstein and His Work in Beijing," *A. Hallerstein - Liu Songling* - 劉松齡, pp. 23-49.

9 閻宗臨主要的研究領域是耶穌會士以及歐洲古代史，他是中國學術界較早研究劉松齡的華人學者，亦提及過他曾接待葡使。詳參閻宗臨著，〈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紀實〉，閻守誠編，《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》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 212-217。

10 Zmago Šmitek, "The Last Great Astronomer at the Chinese Emperor," *A. Hallerstein - Liu Songling* - 劉松齡, pp. 51-115.

11 Stanislav Južnič, *Hallerstein: kitajski astronom iz Mengša* (Ljubljana: Tehniška založba Slovenije, 2003); Stanislav Južnič, "Vacuum and Electricity for the Chinese Emperor," *A. Hallerstein - Liu Songling* - 劉松齡, pp. 119-157.

第四篇論文是中國代表鞠德源的舊作新譯，鞠氏曾任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故相對其他學者，較早接觸過劉松齡的檔案。而事實上，他的論文是中文研究方面，較早期以劉松齡為題材的論文，<sup>12</sup> 故被收錄及翻譯，實屬合理之舉。整體上，鞠氏的研究與米加的論文相若，都是以其文化上及科技上的貢獻為論文主旨，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差異。不過，鞠氏採用的是中國檔案，可以與米加的研究作一對比，能夠讓劉松齡的形象有更多角度的呈現。

第五篇是由 Aleš Maver 介紹劉松齡的書信集及其學術意義。<sup>13</sup> 而最後，則是由 Jason Blake 和 Andrej Stopar 將劉松齡信件從各種古歐洲語文翻譯成英文，以便不懂斯拉夫及拉丁文的漢學研究者，對劉松齡有更深的認識。<sup>14</sup> 這些資料都只有很少數的學者運用過，東亞學者用的則更少，所以這些書信的刊布和翻譯對於漢學界來說，是一個好消息。

全書在議論部分，或是資料介紹部分，是一本讓漢學界初步認識劉松齡這位耶穌會傳教士的入門專書。無論在其一生的經歷、科技及天文方面成就，抑或是一手資料的運用，都有充足的說明。在傳統來華傳教士研究史中，對於他們科技史上的貢獻一直認識不多，可能的原因是融貫科技知識及漢學研究的研究人材寥寥無幾。故此，論文集為我們提出一些他們的科技觀點，有助於了解中國科技史的演變。此外，論文集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珍貴而又有貢獻的視野及資料，讓我們認識劉松齡這位有重大歷史意義及貢獻的禁教期傳教士。

另一方面，編者嘗試結合中國及歐洲兩地的資料及研究成果，將劉松齡的研究進行更全面的整理，避免觀點偏向中國或歐洲一方，造成各種偏見。而且，由劉松齡在中歐交流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，有助於提醒我們傳教士作為漢學界及東西文化交流的媒介，這是論文集另一個值得欣賞的地方。

然而，若以一本研究劉松齡，以及探討在北京活動的傳教士作為研究中

12 鞠德源，〈清欽天監監正劉松齡——紀念南斯拉夫天文學家劉松齡逝世二百一十周年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85.1(1985.1): 53-62。

13 Aleš Maver, Alenka Ropret, trans., "A Word on Hallerstein's Letter," *A. Hallerstein - Liu Songling* - 劉松齡, pp. 209-240.

14 Jason Blake and Andrej Stopar, trans., "Hallerstein's Letters," *A. Hallerstein - Liu Songling* - 劉松齡, pp. 241-340.

心的學術論著來說，筆者認為全書有不少值得改善的空間，故拋磚引玉，就此書及禁教期傳教士研究提出一些想法。<sup>15</sup>

首先，全書除了鞠德源的論文外，均未有大量涉及中國方面的檔案，這是稍微讓人失望的。無可否認，劉松齡的資料極為豐富，但作為一本探討居住於北京傳教士的學術研究，使用的中國檔案可謂少之又少。儘管編者引入鞠氏的論文，嘗試補充這方面的不足，但是鞠德源的論文早於 1985 年出版，對比過中文原著及英文譯著，未見有大量新見。但是，近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在 2003 年已出版了《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》，書中有很多豐富的劉松齡研究資料。<sup>16</sup> 由此可見，論文集編者米加或其他作者並未參考近年中國新整理出來的資料，這有待將來的學者補充及改善。

其次，劉松齡的研究視野，似乎被編者定位為科學家及天文學家，對於傳教士本來應有的任務，編者及論文作者僅草草交代了有關活動，而未作分析及探討。不過，論文集的副題是「智慧與虔誠」，理應與宗教有關。事實上，當參考《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》，作者費賴之（Louis Pfister, 1833-1891）就其所發現的史料，對劉松齡在華傳教事業的態度，已作出了說明。他指出劉松齡一直希望尋找機會向民衆傳教，但事實上卻事與願違。<sup>17</sup> 這點非常重要，劉松齡到北京後，已是乾隆年間，當時乾隆帝多次擴大了禁教的命令，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已慢慢萎縮。此時，傳教士在中國如何履行傳教任務，是值得探討的。不過，本書編著者似乎不認為這是探討劉松齡及同期耶穌會士的重要線索，故亦未進行了解。

---

15 關於資料介紹部分及語文運用上的問題，本文不作詳述，可另參雷敦蘇，〈評 Mitje Saje 編 *A. Hallerstein - Liu Songling - 劉松齡: The Multicultural Legacy of Jesuit Wisdom and Piety at the Qing Dynasty Court*〉，《神州交流》9.3(2012.7): 141-144。

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，《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》（北京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2003）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韓永福，在檔案史料出版後，特別整理了劉松齡的相關資料，並在期刊發表，以便學界參考。詳參韓永福選編，〈耶穌會士劉松齡檔案史料〉，《歷史檔案》2011.1(2011.2): 34-44。

17 「松齡雖在朝陸續治理曆數天文，然於靈魂之救贖，信眾之感化，仍以餘暇盡力為之。其信札有云：『每次與教外人語，不特不將教法隱秘，輒糾正其錯誤，說明吾教真理。來堂過訪者，對於堂中繪畫有所詢問，吾人必為之詳細說明。聽者雖樂聞吾輩言，然因而入教者甚稀。』」費賴之著，馮承鈞譯，《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），下冊，頁 783。

雖然此論文集不無瑕疵，但只要為學術界帶來一定的貢獻，也不應被忽視。而且，未來後學者也可循各種方向，從中尋找突破，為在華傳教士研究帶來各種新觀點。其中，筆者認為可試從在華傳教士研究與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作高度結合。

近年，漢學界常常提出「從周邊看中國」的研究，其中較值得留意的是朝貢國朝鮮的視野。他們定期派往北京的燕行使節，均就他們對北京、中國社會及文化現象等方面的觀感，留下了很多紀錄。這些都是豐富的研究材料。當中，不少學者的視野並不停留在朝鮮人如何認識中國，更探討中國如何成就朝鮮人在十九世紀開港前，對西洋事物的觀感形成，<sup>18</sup> 讓他們在北京能夠接觸傳教士，建立他們的西洋觀。<sup>19</sup>

在華傳教士從來不應只當作科學家或天文學家，而應留意他們本來希望來華進行信仰傳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們是工業化時代以前，東西文化互動的關鍵媒介。更何況，劉松齡不再像利瑪竇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湯若望（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, 1591-1666）及南懷仁（Ferdinand Verbiest, 1623-1688）般，傳教士有朝廷較多的保護。而是身處於政府開始明令禁教，地方官員紛紛藉故告發傳教士，以致不能公開宣教的環境中。劉松齡等禁教期間活動的傳教士，他們仍希望繼續傳教，而不只是單為清廷服務。事實上，劉松齡與洪大容的對話，與日後朝鮮天主教開教有密切關係。<sup>20</sup> 不過，似乎連同論文集的作者們在內，學界未有太多這方面的研究，這個領域有待其他學者開發，讓來華傳教士研究在將來有更好的發展。

總括而言，儘管論文集只集中討論劉氏的科學及天文學上的貢獻，未有

18 楊雨蕾，《燕行與中韓文化關係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 169-182；李元淳著，王玉潔、朴英姬、洪軍譯，《朝鮮西學史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15-40。

19 1765 年，劉松齡任職欽天監正監期間，一位來自朝鮮的使團成員洪大容（1731-1783），在譯官的陪同下，走到北京南堂，與劉松齡交談多次。詳參 Pak Song-nae, "Western Science and Silhak Scholars," in Korean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, ed., *Korean History: Discovery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s* (Elizabeth, NJ: Hollym, 2004), p. 339; 並參洪大容，《湛軒燕記》，《燕行錄全集》第 42 冊（首爾：東國大學校出版部，2003），卷 1〈劉鮑問答〉，頁 42-48。

20 李元淳著，王玉潔、朴英姬、洪軍譯，《朝鮮西學史研究》，頁 23-27。

涉獵關於文化及宗教上的影響性，這是稍有不足之處，但是米加和其他作者的研究，卻為在華傳教士研究及漢學界，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及新觀點，去認識劉松齡以及那時候的傳教士在華生活，更提醒了在華傳教士研究可擁有的視野，還有很多討論空間，值得漢學家繼續善用及發揮。

